

列宁三次被害记

〔苏〕邦奇——布鲁耶维奇著

柏森 苜萝 蔡汀 容方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福州

列宁三次被害记

〔苏〕邦奇——布鲁耶维奇 著

柏森 苜萝 蔡汀 容方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4.625印张 109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0

书号：11173·90 定价：0.55元

1

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 对列宁的谋刺案

（根据这一案件侦查人员的个人回忆，并参照一名谋刺活动参与人所写的两份手稿）

柏 森 译

我要在这里述及的列宁生活中的这一起凶险事件，很少有人知晓，也很少有人作过探究，而且有些情节尚待认真加以阐明，不过确都属于史实。

由于我疲劳过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强令我到邻近的芬兰去休憩一段时日，所以出事那天我不在彼得格勒^①。我所主管的斯莫尔尼宫“第75号办公室”，是一间负责监视各种反革命活动的办公室。我离开时把工作托付给了我的助手菲什曼同志，当时他还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在我们队伍里担任负责工作了。我在那边休息得不好，心里总惦记着赶快回彼得格勒来。一月一日清晨，我坐车返回。当我抵达穆斯塔米亚基车站时，得知火车不开。不知什么原因，从彼得格勒来指示说，不许车通行，更令人惊奇的是从芬兰到彼得格勒的车子竟一辆也不曾通过。

车站上，旅客中间的情绪很坏，带有明显的反动气氛。我在这儿不止一次听到当地的资产阶级和商人们针对我所提出的刻薄的指责。有谣言说，芬兰那边，在维堡附近爆发了起义，说起义者

① 列宁格勒在列宁逝世前称彼得格勒。——译者

占领了车站，并阻止火车通行。谣言越来越盛。火车始终没有来，我们已经准备骑马走了。下午四点钟光景，从白岛方向开来一列火车。它在穆斯塔米亚基只停了一分钟，很快又开走了。车头上、车厢里，以至车厢连接处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他们都是回自己部队去的。

我走到月台上，看到这些身穿士兵大衣的人，心里很沉重，他们完全丧失了军纪，朝天乱放枪，糟蹋国家的宝贵财产，引起了大家的极度反感。

群众四散奔窜。我在月台上站住，大声向士兵们呼喊：

“你们干吗打枪？这是糟蹋子弹吆……”

火车开走了，对于我的话，当然谁也不予理睬。记得有那么一个士兵还举起枪晃动了一下，以示威胁。

这些细微末节已经足够让芬兰的特务们向本国政府送报告，说我是侵犯芬兰的俄国士兵的“指挥官”。于是，芬兰的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便长时间对我进行辱骂，久久不息。

天黑下来了，最后我们终于从站长那里获悉，从彼得格勒开来一列客车。这是一列运送休假期满的水手返回舰艇去的客车，但是芬兰政府决定将客车拦在穆斯塔米亚基，不让前行，而要所有俄国旅客坐这趟车到彼得格勒去。

列车驶近了。水兵们从车厢里下来。站长作了解释。我向水兵们说出自己的姓名，请求他们让我和我的家属上他们的车厢里去。他们很乐意地同意了，还帮我递行李，几分钟后我们就进了车厢，并展开了很有意思的谈话。

时间很晚了。火车是八点左右往回开的，一直到将近十一点才抵达彼得格勒，这么短短的路程花了整整一天。快到夜里十二点，我才到家。刚进门就接到斯莫尔尼宫第75号办公室来的电话，让我马上去一趟，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当然马上驱车前往。原来，白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到一个团队去参加群众大会。在回来的路上遭到了枪击，汽车被打穿了好几个窟窿，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车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普拉金被打伤了手指头。普拉金下意识地扑到列宁身上，一颗子弹正好打在普拉金正护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头部的一个手指头。很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的处境真是一发千钧呀！

我真想立刻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他已经睡了。我会见了玛丽娅·伊里尼什娜^①。她责怪我，说我离开以后这里乱成了一团麻，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都处在那样的危险中。

我听了以后内心非常痛苦。显然，这一趟还是不去的好，即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了指令，也是不该去的。

我立即着手进行侦查，心想哪怕先掌握一些初步的情况也好。这一夜我们只摸到一点点隐隐约约的线索，说是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军官组织，正在寻找机会谋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此后，尽管我们搜查了好几天，仍然什么结果也没有。

二

第二天清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我时心情十分愉快。当我告诉他我们已对他的被刺事件进行了侦查时，他立即投过来锐利的目光：

“这是干什么？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做了？这完全没有必要……革命时期留下来一些不满分子，他们现在要开枪，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至于你们说的有什么组织，这又有什么稀罕的呢？当然会有的。军事组织？军官团？非

^① 玛丽娅·伊里尼什娜，列宁的妹妹。——译者

常可能。”说完，他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

我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件事，我直率地向他表示，这次谋刺不仅仅是针对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个人的，也是针对政府首脑，而政府首脑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利让它不了了之。

我请他给我详细讲讲当时的情况。可他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说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说要是实在需要，最好还是去问跟他同行的其他同志。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方设法在敷衍我，不想提供任何证据。

每天送到斯莫尔尼宫第75号办公室的侦查材料络绎不绝，不计其数。可是这种种材料并未给我们这桩重大案件提供任何新的线索。偶然的机会却帮了忙，这倒也是常有的事。

三

有一次，从我住的沙地公寓出来，顺着赫尔松大街，到五号楼去坐汽车上斯莫尔尼宫。忽然被五十来名住在附近的男女工人拦住了，其中许多人跟我都挺熟悉的。他们很关心某几个法令，想听听我的解释。我当然停住了脚步，并开始很高兴地给他们讲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突然我感觉到，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从离我很近的地方向我射过来一个尖利的目光。这是一个穿着大衣的挺威武的士兵的目光。他那一双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还是继续在回答工人们的问题。而当我满足了他们的全部心愿时，便向他们告别，跟他们握手，告诉他们我还有事急着去办。

“您什么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呀？厂里大家都等着您去呢！……”我的一个熟人，附近一座卷烟厂的女工沙普沙拉对我

说。“快来吧！工厂委员会还让我去找您呢……”

我约定夏天去，还说了一个日子，就上了车。车子离开人群向前开去。

“好叔叔，带我们一段吧！”孩子们来缠我了。

“喂！”那个士兵突然冲着我。“我可以在什么地方见见您，跟您谈谈呢？……”

“什么事？”

“我要打死您，”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直盯着地望着我的眼睛。“本来是想马上开枪的，可是工人们跟您谈得那么推心置腹，这就使我犹豫了起来……”

“这很有意思！”我回答他说。“伙计，那您找我又想干什么呢？……要是想谈谈，那就请上车吧，咱们一块走。”

“不，我还是走着好。”

“那您就不一定会来了！”

“一定来！”他执着地说，两只眼睛透出一股火气。

“那好，到时您就到斯莫尔尼宫来吧，到那里您再打听我好了。”

“可人家不放我进去呀……”

“会放的，您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您知道我叫什么吗？”

“知道。”

“好，尽管来。”

“我一定来。”

于是，我拉上了车门，叫开车。我们也就走了。

“这岂不是怪事？”我心里嘀咕着。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在家里，我们的保姆曾几次给我讲过，说是这几天常有一个士兵来我们家，要求见我；而当她告诉他说我不在家，我去工作了的时候，他就暴躁地答道：

“您尽胡诌，您把他藏起来了。”

“‘你说什么，我的天！’我对他说，”保姆给我诉说道。

“谁把他藏起来了，他连家也很少回，老是跟人民在一起，找他的人真是成千上万呀……”

这时他开始详细地盘问起保姆来了，问她上我这儿来的尽是什么人。当他听说都是些工人和农民时，他感到十分惊讶。

“这有点不对头，”他自言自语地一边嘀咕，一边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过。

当时，我对这一番谈话确实丝毫没有介意，因为到我这儿来的各种相识的不相认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里边总有点什么道道，”我这么想着，车子已经到了斯莫尔尼宫，“也许说不定是一个疯子，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那时候这种人是不少的。

我对第75号办公室的几个同志讲了我碰到的这件趣事，随即开始处理当天的事务。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得到通知，说有一个士兵强烈要求见我，说他不愿意等候接见的_的时间，因为他有紧急的秘密事要向我报告。

我命令让他进来。

“莫非真是他？”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看着，来了。

哈，果真是他。

“呀，我这不来了吗？”他说，“把这枪给您，这就是我原来要用来打死您的枪，”他把那支枪放在桌子上。

“您是什么人？”一个工人同志问他。

“我是前方的一名士兵……刚从前线回来不久。我姓斯皮里多诺夫。”

“请坐，同志，”我对他说。“您不是要跟我谈谈吗，好吧，我现在有时间……”

他坐了下来，似乎颇有点负疚地说：

“刚才要是再拖一会儿，我就朝您开枪了……那可就出大错了呀……那些女工们……是她们拖延我开枪的。她们跟您谈得那么推心置腹……我因此想，这不是那个我要刺杀的人，那个人是敌人，而您是什么敌人哦？我看得清楚，您是自己的兄弟，”他微微一笑。

这会儿我尽量用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引导他的思路，让他去考虑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我很想知道，他是跟谁有联系呢，还是他独自行动的？……

“请等一等，我把什么都讲出来……您不要急……”他回答我，仿佛猜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周围聚拢来一些工人，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对这位来访者都很感兴趣。

“我的妈呀！”斯皮里多诺夫突然站起身来说道。“在这儿的都是工人嘛，都是我们的弟兄嘛，可他们说都是些德国人，先生们……尽跟我胡诌了……”

一个黑脸工人，身体很结实，干锻工的，工厂的烟把他熏得满脸漆黑，在斯皮里多诺夫肩上拍了一下，笑着说，“老弟，我们这些德国人可是跟你这个鞑靼人差不多呀……”

周围响起一阵笑声。

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就谈吐自如了。他开始讲他在前线时的情形。在那里，他们的部队全跑散了，而他和几个同伴一道来到了彼得格勒。他的同伴里有几个军官，决定要枪杀列宁。他说这里有一个军官组织。委员们警觉起来了。我简要地记下了一些最重要的内容。他说出彼列库普诺伊胡同的一个地址，这是那个组织

中的一部分人的集合地点，他本人也常去那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女人家里谋划的，但其余的人就在哪里，他不知道。

四

我看得出来，他手里掌握着线索。

可怎么对待他呢？逮捕他？那肯定要砸锅的。放了他，让他自由，很可能他会对现在的作为后悔起来，而去向所有的人通风报信。

我走了出来，悄悄地招呼了二三个工人委员，请他们告诉大家，要马上对斯皮里多诺夫表现出巨大的关怀：要陪他一起吃饭，让他在我们的圈子里生活，给他讲革命道理，再带他到各处走动走动，带他去参加工人大会，但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我们的看护。大家也都这么做了。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就成了自己人，而且总是竭力不离开我的左右，外出时总是设法保护我，有好几次还是相当危险的呢。

这天晚上，我们在彼列库普诺伊胡同的那所房子里逮捕了所有的人。我们在那里预设了埋伏，他们一个个来到这里，一下子都落了网，这些人分别被送到了斯莫尔尼宫。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案情也就愈来愈明朗起来了。

两天以后，我们接触到了比较接近核心地位的人了。最后，逮捕了三个军官，他们都是谋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案件的直接参与者。但很明显，他们也不过是某些更厉害的人物手里的工具而已。其中有一个人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还真有点“牺牲精神”，我倒觉得这个人很有些头脑，也很可爱，也许是真心实意地走上了歧途的。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案件的经过情形，可他虽然

险些挨到这些年青人的子弹而丧生，却成了案件侦查的最难以排除的障碍。他倒象是这些被告的辩护人，给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又是怀疑证据的可靠性，又是要求对已经清清楚楚的材料再作一次核实，而且对这些暗杀者个人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

“您多给他们一些文学作品看看，让他们多读点书，”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还问到我们给犯人发了报纸没有。

五

这是些什么人呢，竟敢对十月革命的领袖，对能够如此惊人地体察并反映战斗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需要、目标和意愿的人下这样的毒手呢？

这一切很久都搞不清楚，而如今，由于偶然发生的情况，我们掌握了真实的历史证据，这是险些酿成大灾大难的这幕历史悲剧的一个实地参与人提供的历史证据。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坚决地、以一种不容争辩的确切性，详尽而细密地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遭谋刺的整个案件作出结论了。

这次谋刺的计划是在前线产生的。当时那场帝国主义大战出现了一种不战不和的相当困难而又不确定的局面，我们这方面提出了停止战争的要求。于是，前线彻底瓦解了，军队放任自流，四处奔窜，许多人急于回家。

在前方，跟后方一样，地主的庄园荒芜了。

所有的部队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坚决主张和平，从战场上撤下来，即使要触犯军队的纪律，要扔掉武器、弹药，也在所不辞；另一派则主张维护秩序，恪守军纪，不要扰乱战事，如果需要，可以正当地、有秩序地撤退，办好武器、物资的

移交，要保护好后方的财物。

前者听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后者对之忿恨不已，认为那是叛变，是德国人搞的勾当。

我们所引用的一篇手稿的作者①写道：

“对方的那一派被包围了。我们身边随时带着枪。他们怕我们，这对我们很有利。夜晚，我们都集中在一间简陋的大茅舍里，大家睡在一起，门口派了岗哨，睡下的时候，身边都有老婆陪着，‘我们的老婆便是子弹上了膛的枪’。

最后，我对肖马说，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我们应当马上把我们的部队复员回家。有些人已经自动走了，所谓‘撒腿溜号了’。这不合适。即使要死，我们也要死得象个人样！

难道我们不是一支队伍，我们这支队伍不也有那么三十来号人吗？难道我们不是老兵，我们没有尽心竭力去履行军人职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团曾在普列夫纳光荣地作过战，我们不也曾经在基利尔—巴博伊厮杀过的吗？我们团的军旗平时保存在一只褪了色的皮套子里，宿营驻扎时就放在团长的床头。我们宣誓时都吻过这面旗帜。只要战斗一打响，军旗就冲到前头，率领我们冲杀。可现在，团长上哪儿去了，这面军旗又在哪儿呢？

既然和平可以‘一个连、一个排’地去搞，那就是说，我就是最高司令官，你就是司令部的参谋长，写一份复员命令吧！斯皮里多诺夫代替共和国委员签署命令，奥尔洛夫按军需部门的规定去具体执行这一命令。

‘你就最后一次集合队伍吧！’

‘怎么集合？’

① 这个作者取了一个化名，叫列舍托夫，他的这篇手稿题名《热情的皇帝》。

‘全副武装。’①

队伍最后一次集合起来了。全都是按规定进行，按军队的一套，按条令办，遵照古老的军事课目的传统办。

令人悲痛的时刻来到了，曾经在行军和战斗中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甚至在死亡临头时结下了深情厚谊的一支队伍就要自动解散了。”

让我们接着读下去。

“于是，我们宣布，战争结束了，每一个愿意走的人都可以领到证明，愿意去哪儿都行。我自己从肖马那里领到一张证明，他也从我这儿领了一张。侦察兵兴高采烈地忙着打点自己的背囊。

傍晚六点是最后一次检阅的时间。摩尔达维亚人的院子显得很拥挤，但渐渐地由于队伍稀疏起来，院子也就空旷了许多。大家站着，我也站着，肖马在那里指挥。我向大家问候致意。

‘难道队伍不穿军装，难道列队时队伍可以不把行军装具全副武装起来？我最后一次察看了一下那些家当，每人还都有大衣、靴子、子弹带，还有枪。’

‘谁要是喜欢，可以把枪带走！’

在大衣、子弹带、枪支中间闪动着一张张脸，很有生气的脸。可我不敢朝他们看，因为那上面反映着一颗颗士兵的心。

‘也许，谁还有什么要求吗？那就提出来吧！’

‘什么也没有？那好吧，朋友们，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大家互相道别，口气多少有点庄重。要是肖马不把乐队搞得那么糟的话，告别仪式大概会相当庄重地结束的。

本来根本不需要他去张罗的嘛！

① 见列舍托夫的手稿：《热情的皇帝》，后面几则引文亦见此手稿，不另注明。

他也不会发表什么庄重的演说。

他走到外边去了，哭了起来，真不象样！

别的人为什么也哭了呢？

我转过身子，挥了挥手。

这时，司务长走到队前，下了口令：

‘解散！’

就这样，部队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领到了回家的证明，接着就开始准备各上各的路了。”

作者给我们讲述道：

“侦察兵们高高兴兴地忙碌着，在打点自己的背囊。我呢，一个人漫步走去，我不相信，一切都已死去了。这种情形，在一个亲近的人故世时是常常会发生的。忽然人死了，你不相信他已经死了。那死亡实在无法想象。当我想起这一切都已经死去时，在心灵深处倒反而萌生了一股不可告人的轻松感。这是别人所无法理解的，因为病人受苦的时间太长久了，太折磨人了。可那又是多么强壮的一位老人呀！

傍晚，迫击炮小队的司务长给我们送来了葡萄酒，迫击炮小队在我们团里有个雅号，叫‘打了就跑’小队。他们的司务长可是有名的葡萄酒供应者。

为了告别，大家喝了不少酒。当天夜里，第一批人员上了火车。分别时谁都舍不得离去。大家相互留下了通信处，相约要保持联系。正是这天夜里我送走了斯皮里多诺夫，跟他约好在莫斯科见面。他去乡下探望亲人。”

熟识的人相继离去，剩下的人感到分外冷清。满腹的忧愁，引得人越发思念往事。可怕的三年，战争、苦难、死亡、灾祸的三年。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呀？无法回答，找不到答案。以前有明确的目标，生活丰富多彩，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一切都崩

溃了；阵地上的最后一天，对那些不理解创造性现实的人来说，对那些跟不上事态的发展、落了伍的、缺乏阶级意识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就不象千百万穿着士兵大衣的贫苦农民、工人和其他贫民那样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贫苦的大众是被富有权势的专制制度驱赶着上了前线的，眼下他们是兴高采烈地从战场上、从战壕里下来的，就好象从长年的奴役、强暴和受压迫之中逃脱出来的一样。

战争时期非贵族出身的下级军官和地主、资本家之间并没有血肉般的联系，也不受战时纪律所约束，他们对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其中有很少一部分人懂得并同情于一心向往和平的士兵群众。于是，令人惊骇的巨大的冲突便在这里酿成了，这种冲突包孕着难以预测的后果。这里日益形成的反革命军事势力的一切基础可以说已经存在，这预示着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内战即将爆发。

六

我们的作者写道：

“我们把行期定在明天。夜间，明月高照，微风习习。这是最后的一个夜晚。

我朝那暗白的朦胧之中望去，油然想起两年以前在离明斯克不远的新斯维尔任也是这样的夜晚。一年前我们驻扎在喀尔巴阡山，团队刚刚撤出战斗。那是冬天。喀尔巴阡山银装素裹，气象万千。时间过得多快，这短短的一年之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还是让我最后一次骑一骑那匹青鹰马吧！

山村外边风能穿透厚厚的罗曼诺夫短皮袄。风扑面吹来。马大口喘气，跑得很吃力，我尽量赶它。我想尽快翻到山脊的那一